

【学术论文】

清代官员子弟科举的制度设计

刘佰合

摘 要:清代科举集前代之大成,已臻于成熟,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和周密的制度,以设立官卷与亲族回避为核心的官员子弟科举考试制度,亦为清代科举体系重要的构成部分,考察和理清该制度的基本设计与运作情形,有助于深化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关键词:清代 官员子弟 科举制度

清代科举集前代之大成,已臻于成熟,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和周密的制度,以设立官卷与亲族回避为核心的官员子弟科举考试制度^①,亦为清代科举体系重要的构成部分,考察和理清该制度的基本设计与运作情形,有助于深化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一 独特的官卷制度

清代官员掌握着体制内外的各种资源,其子弟在和平民考生竞争时处于非常明显的优势地位,更可能因此导致科场弊案,这就和清朝廷开科取士、遴选真才的目标产生矛盾,对官员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进行规范和限制的官卷制度应运而生。官卷作为一种独特的制度,不仅体现了对官员的笼络与照顾,更是对该群体的约束和限制。

康熙皇帝在创立官卷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会试后,他敏锐地觉察到科场存在严重问题,接连发出两个质问,一问“今年会试所中,大臣子弟居多,孤寒士子未能入彀,如此欲令人心服,得乎”^②?二问“考取举人进士,特为得人耳。若或行贿夤缘而得之,则出身之本源不清,而欲冀他日之为忠臣良吏,得乎”?他提出:“凡系大臣子弟,另编字号,令其于此中较阅,自必选择其文之优劣。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如此,则于考试一事大有裨益。”^③此处所谓“不致妨孤寒之路”颇关紧要,体现了康熙帝对科举考试社会作用的深刻认识,也是清代建立官员子弟科举体制的根本意义所在。但九卿科道初对康熙帝的方案抱持消极态度,康熙又令所倚重的李光地、张鹏翮等四人详议具奏,意在寻求支持。至十一月九卿最终议复,确立了官卷制度的基本框架,直隶各省乡试在京三品以上及大小京堂、翰詹科道、吏礼二部司官,在外督抚提镇及藩臬等官,“子弟俱编入官字号,另入号房考试”,“会试满合字号、南北字号亦编官字号,每二十卷取一卷。云南等四省中额仍照现例行,不另编官字号”^④。

官卷之制初行于乡会试,康熙五十一年会试不再分南北字号的同时,停止编官号。部分边省乡试因官生人少而不分官民卷,后则分立,贵州因居官者渐多、人才渐好,且又添拨遵义一府,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乡试官民分卷,乾隆六年(1741年)广西援贵州之例设立官卷。

官卷编入的资格限制主要包括应编官卷之官员及官员亲属范围两个方面,官卷制度初立之时议定,“八旗直隶各省现在文武大臣以下,京官文官以七品有职掌、武官佐领等官以上,外官知县、守备等官以上官员,其子孙、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皆编为官卷”^⑤。后经更动调整逐步形成定制,《钦定科场条例》载之甚明:“在京满洲汉员文官京堂以上及翰詹科道、武官副都统以上,在外文官藩臬以上、武官副都统总兵以上,其子孙曾孙、同胞兄弟、同胞兄弟之子,皆编为官卷,其祖父伯叔毋庸编入。”^⑥

应编官员范围呈现缩小趋势,逐步向高级官员集中,吏礼两部因掌官员考核与科场事宜,其司员子弟一度列为官生,后皆取消。另对候补、丁忧、降级、署理、休致等情形均有所说明,尤以休致官员的规定最为具体,除因老病自行具折乞休者准编入官卷外,其他情况皆不准编入,于此已将官卷编入与否和官员之考核紧密联系到一起了。官员亲属以子孙、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为基本范围,其后在略有扩展的前提下严格限定,乾隆五十一年以曾孙亦系一脉周亲、非与子孙情有分别,所以规定遇有曾孙应试者应一体编入官卷。乾隆十七年以“父与伯叔编列官生,名义殊觉未安”^⑦为由,明确禁止直省乡试将官员祖父叔伯编为官生的做法。其后又规定,恩养异姓之子及已出继之子均不准列入官生,若本官出继,其本生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亦不准入官卷。这些规定既与宗法体制相适应,亦为防止官卷过滥滋弊。

官卷本为防止和纠正官员子弟侵占民卷中额而设,如何设计其录取方式也就显得非常重要。康熙时按照官民卷大约同等比例方式确定官卷中额,顺天乡试满合字号因大臣子弟较多,“如民卷百卷取中五卷,则官卷二十卷取中一卷;其直省如定额十卷,民卷取中九卷,官卷取中一卷,其副榜亦照此计取”^⑧。乾隆十六年按照“以官卷多少酌定中额”^⑨原则,确定各乡试官卷中额,顺天贝字号、江苏、福建各四名,浙江六名,江西五名,河南、山东、山西各三名,南皿、北皿及湖南、广东等省各中二名或一名。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官卷录取过多过优的现象,违背了限制官员子弟的初衷,遂有减少官卷中额、甚至废裁官卷的建议。乾隆帝意识到官民分卷“立法之始,本为防弊,而彼时诸臣奉行,不无偏袒子姓亲族之见,含糊具奏,分定中额,未免过多,遂使以怜恤寒畯之意,转成优幸缙绅之路,揆之情理,实未允协”,提出“中额贵有限制,而立法务在均平”^⑩的录取原则。按照该原则,各省乡试官卷按大、中、小省确定中额,直隶、江南、浙江等大省,入场官生二十名取中一名、三十一名取中二名;山东、河南、陕西等中省,十五名取中一名、二十三名取中二名;广西、贵州等小省,十名取中一名、十六名取中二名。顺天乡试,满洲、蒙古、汉军照小省取中,南北贡监照中省取中。该取中原则将定额录取与按比例录取结合在一起,官卷中数以定额为限,不得逾额多取,如官卷不敷,缺额则以民卷补足,相沿成为定例,仅在具体定额及比例方面偶有细微调整。

二 缜密的回避制度

清代朝野上下均以科举为至隆至要之抡才大典,入闱官员在科举体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或判卷衡文,或办理考务,若对子弟亲族稍有偏心徇私,则失考试公平,回避即为针对此潜在弊端的方法之一。回避之法始于唐朝,至清已趋于缜密,有亲属回避、籍贯回避、命题回避、阅卷回避、磨勘官回避等规定,其中以亲族回避最为严苛周备,本文所论主要即指此种回避。

顺治十五年(1658年)题准,“凡乡会试考官、同考官、监临、知贡举、监试、提调之子及宗族应试者”,“照例回避”^⑪。其后规定渐多,考官及其亲属范围逐步扩大,到光绪朝时堪称严密繁复。乡会试内帘主考、同考、内监试、内收掌,外帘知贡举、监临、提调、外监试、外收掌,受卷、

弥封、誊录、对读四所,“各官之子弟姻族俱令照例回避”。此所谓“子弟姻族”所涉范围极广,包括子弟、同族(含五服以内及聚族一处者)、外祖父、翁婿甥舅、妻之嫡兄弟、妻之姊妹夫、妻之胞侄、妻姊妹之子、嫡姊妹之夫、嫡姑之夫、嫡姑之子、舅之子、母姨之子、女之子、妻之祖、孙女之夫,及本身儿女姻亲,“概令回避,不准入场考试”,且“回避官生毋庸另行考试”^⑫,这当中最核心者无疑是考官之子弟。从朝廷立法角度论,是要求考官子弟亲族回避以免嫌疑,而从考生方面来说,则意味着因父兄或其他亲族做考官而丧失入场考试的资格与机会。

回避之规对官员子弟参加会试和顺天乡试影响很大,对其他乡试影响相对较小,但江南乡试是为特例,部分官员子弟,其父兄并非入闱考官,亦须回避。江南乡试因江苏、安徽分省合闱,规定江苏人员现任安徽司道、安徽人员现任江苏司道以上等官,及江苏人任安徽学政、安徽人任江苏学政,并安徽人员现任江宁省城首府首县,“并未入场之各员,其同族有服制者,及外姻各项,俱令回避”;另外江苏人员现任安徽知府、直隶州,安徽人员现任江苏知府、直隶州者,“如遇所属州县开送帘官,其同族有服制者,及外姻各项,俱令回避,匿报者查出,本官革职”^⑬。陕西乡试因系陕甘合闱,仿照江南乡试之例,亦行两省有关官员子弟回避,至光绪初年分闱而止。

雍正帝即位后对回避之法进行了较大改动,乡试从雍正元年、会试从二年开始考试回避官员子弟,此亦即回避卷之制,他认为“入闱各官为国家宣力,伊子弟反不得应试,殊属可悯”^⑭。回避官员子弟考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另行考校”,如元年在午门内试以四书文二题、经文一题、表策各一题,从中取四人为举人;二是“一体考试”,即回避官生与其他考生一道入场考试,但另编坐号与字号,酌量取中入榜,其依据是雍正二年上谕,言“乡会试为抡才大典,内外帘官子弟理应回避,但跋涉数千里,志切观光,既至京师,不得与试,深为可悯……今科凡官员入闱者,其子弟著一体应试,将试卷另封进呈,朕派大臣校阅遴选,庶人才不致屈抑”^⑮。乾隆九年,乾隆帝再改回避之法,以“各科回避官生多寡不一,若遇人少之年,则入彀甚易,于科场条例亦不画一”为由,决定“自以照旧回避为是,嗣后不必一体考试”^⑯。乾隆九年和十七年顺天乡试和会试回避卷先后停止考试,该制自产生到废止,不过二三十年时间,可视为清代回避制度的另类插曲,但其意义却不应完全忽视。

清代官员异地为官,子弟多有随其生活者,在为官之地参加科举考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清代对官员子弟在其任职之地参加科举考试始终没有放开,明确规定“官员在现任地方令子弟等冒籍者,本生斥革,该员革职”^⑰。《钦定科场条例》虽然是在《冒籍》卷规定官员子弟不得在现任地方考试,其实质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回避,即地域回避,立法本意在防杜官员借机滋弊,这也就意味着官员子弟必须回原籍参加考试。例如晚清重臣张之洞原籍直隶南皮,因其父官于贵州而出生在贵州,并长于贵州、受教于贵州,但他的科举之路是从13岁“回籍就试”、次年入南皮县学开始,16岁时参加顺天乡试,中试第一名举人;虽然张之洞得科名甚早,但其回避经历却也十分典型,咸丰九年(1859年)和十年两科会试均以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而“循例回避”^⑱,到同治二年(1863年)癸亥科得中探花。

三 严厉的防惩制度

清代关于官员子弟科举的各项规定日趋繁复细琐,或为未雨绸缪而完善规条,或为针对科场弊案而亡羊补牢,既然有人试图突破禁令侥幸获中,就有必要制定后续规章,保证官员子弟科举相关制度的有效落实。

防惩制度以防为先,历代皇帝屡发谕旨,或剴切教导,或直言申斥,训诫大臣官员恪遵功令、

持廉秉公、砥砺节操,试图从源头预防官员子弟违禁考试。为杜绝弊端而不断改进和完善各项条例,甚至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官员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准入官卷,但如该官本人出继,其本生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能否准入官卷就存疑问,遂定不准编入,或者官员改籍他省,则仍在原籍的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亦不准编入官卷;再如已有“本身儿女姻亲”回避的规定,光绪九年(1883年)又明确规定未经成婚的儿女姻亲也在回避之列,堪称周密。预防之制还表现在设定各项考试过程中的程序性规范,例如考官入场之日,至公堂移会内外帘官及场内执事各官,“将应行回避各生姓名自行开出,汇单交知贡举、监临及至公堂监试御史详加复核”,然后由点名御史“于名册扣除,仍揭示贡院外照墙”^⑩,以示公正。

防惩体系以防为先,却以惩为重,官员及其子弟如敢于违犯条例,以图侥幸,就要承担巨大风险,其惩罚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处分极重,再是株连范围很大。官卷凡出现以不应编入之人编入、应编入之人而不编入的情况,均应“由部指参议处”,处理人员株连范围很大,八旗官卷若混入民卷取中,“查系本家漏报,将本官革职、本生黜革”^⑪,如系佐领漏报,则将其降二级调用,参领降一级调用,都统、副都统及总管内务府大臣皆以失于查察而罚俸一年。对于不应编入而假借冒充混入官卷者,或经查出与告发,照例治罪,本官革职、本生黜革,出结造送的教官州县均照循情例降二级调用,知府、直隶州、知州照蒙混造册例降一级调用,布政使降一级留任,巡抚与学政则罚俸一年。对应回避不回避而中式者的处罚是“本官革职、该生黜革”,江南与陕西乡试有关应回避的不入场官员,如匿报查出也是“本官革职”^⑫。对允许子弟在任官地参加考试的情况是零容忍,处分亦很严厉。

四 官员子弟科举制度的实质

清代科举有另编字号以资识别之制,如鹵字号、耳字号、丁字号、聿字号等,均含对特定地域或特定阶层的优待鼓励之意,但与前述另编字号不同,官员子弟科举制度设计与实施的实质则是对这一特殊群体的限制。

官卷之设,从表面看是对官员及其子弟的笼络及优待,因为官生中式比例要高于总录取比例,时有官卷过优之议,不断有官员试图将不应编入之人混入官卷,以致朝廷三令五申予以限制的状况也可说明此点。但若换一种角度审视,较之未设官卷之前,官员子弟的中式比例下降了;如果不立官卷,官员子弟与平民子弟一体应试,由于官员拥有更为丰富的资源和广泛的人脉,其子弟会有更高的取中机会,也就是说设立官卷、按比例定额录取的措施,实际上使官员子弟的录取比例及进取机会降低了。乾隆帝所谓官卷“既免滥取之弊,亦不致有妨孤寒”^⑬的说法,正体现了推行官卷制的真正用意,也就是不与民卷争额,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官卷制是对官员及其子弟群体的约束和限制,制度设计者试图借此防止其利益借助于特权在科举领域恶性扩张,从而保证科举体系的平稳运行,亦利于统治基础的稳固。

回避之例,本为防弊而制,对官员子弟进取功名的限制亦极明显,他们因父兄入闱而不能参加考试,对个体来说会减少甚至丧失获取功名的机会,就群体而言,官员子弟中式数量亦受影响,其出路也因此产生一定程度的阻滞,诚如清人福格所论,回避之例“似觉太严,竟有士子一连四五科皆以回避不得预试者。若当壮盛之时,蹉跎十余年,即成衰老,深为可惜”^⑭。清代官员对这种阻碍和限制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试图有所改变,其应对之策约有两途。积极之策是重新实行回避卷,睦朝栋、郭仪长先后建议回避士子另行考试,均被驳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礼部尚书祝庆蕃再请,道光帝大为光火,斥祝“独出己见,率行面奏,实属沽名钓誉,冒昧渎陈”,明确表

态“回避士子另行考试,事属难行,叠奉圣训昭垂,岂容臣工任意读请”^{②④}!部分官员为不碍子弟亲属考试取消消极之策,往往托故请假不入闱场,事不罕见,但也可能面临制裁,如咸丰八年粮马通判萧鼎禧为其胞弟应顺天乡试,托病告假,被咸丰帝斥为“实属取巧规避,著先行交部议处,其有无营私肥己等弊,著俟刑部讯明后,照例办理”^{②⑤};同治七年会试提调梁僧宝患病请假,仍令该员将应行回避之人照例回避,遂将部分官员的消极应对化于无形。

清代官员子弟科举体制确立之后未有巨大反复与曲折,在趋向繁复周密的同时,总体运行较为平稳,晚清科举变革过程中也没有成为舆论冲击的焦点,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而终止。官员子弟科举制度的核心本质是对特殊阶层的限制,这种限制同时在两个层次产生影响,一方面官员子弟的科举利益受到约束,甚至部分合理权利也被迫让渡,另一方面“不致妨孤寒之路”设计理念的实施,使平民获得了更多的进取和上升机会,这意味着社会基层的精英能够借助科举考试不断地流向统治阶层,在增强统治阶层活力的同时,更利于社会的稳定。官员子弟科举制度是寻求特殊群体与社会整体之间利益均衡的产物,制度设计者更倾向于通过限制官员子弟的科举利益,谋求科举体系有序运行和社会稳定的深层利益。

注释:

- ①该论题尚少关注,未见有专文探讨,魏秀梅著《清代科场回避制度,1645—1906:以文场乡会试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李世愉著《清代科场回避述略》(《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张学强等著《明清“冒籍跨考”现象探析——兼论对解决当代“高考移民问题的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5期)等文对与其有关的回避、冒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均非从官员子弟科举角度立论。
- ②《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卯,中华书局1985年版。本文征引《清实录》均为中华书局1985—1987年版,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 ③《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九九,康熙三十九年六月丁亥。
- ④《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二,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丙午。
- 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四十五《礼部·贡举·设立官卷》,《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⑥《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五《设立官卷限制》,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
- ⑦《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乾隆十七年七月丁卯。
- ⑧《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四十五《礼部·贡举·设立官卷》。
- ⑨《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二,乾隆十六年十一月甲子。
- ⑩⑪《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五七,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壬午。
- 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四十五《礼部·贡举·开报回避》。
- ⑫⑬⑭⑮《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六《回避》。
- ⑭《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十二,雍正元年十月丙子。
- ⑮《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二十三,雍正二年八月甲戌。
- ⑯《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二三,乾隆九年八月乙丑。
- ⑰《钦定科场条例》卷三十五《冒籍》。
- ⑱胡钧:《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23页。
- ⑲《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五《设立官卷限制》。
- ⑳福格:《听雨丛谈》卷二《科场回避》,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页。
- ㉑《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四四,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庚子。
- ㉒《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二六二,咸丰八年八月己巳。

(作者刘佰合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邮编 235000)

(责任编辑 哈恩忠)